

梁启超的目錄學理論觀點和實踐活動

陳 光 祚

梁启超（1873—1929年）是我国著名的改良主义者，同时在我国近代目录学史上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目录学家。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論观点和實踐活動，反映了这一时期所出現的资产阶级目录学的理論和實踐，并且是它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梁启超的目录学活動，对于这一时期目录学新面貌的产生，起了发凡起例、开拓局面的作用。

在近代，随着社会性質的变化，出現了新的階級和新的文化思想，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封建統治階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各种政治力量及其文化思想之間的相互斗争，形成了錯綜复杂的局面。反映在文化上，当时不仅有“中学”，而且还有“西学”“新学”。在圖書方面，不仅存在“旧書”，而且出現“新書”。这就使得近代的目录学面临着新的政治使命和文化、圖書狀況。从而使目录学本身，也出現了新的变化。其主要表現之一，便是我国资产阶级目录学的产生和它的初步发展，以及它給目录学所帶來的新的面貌。这个新的面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書目的社会作用和战斗性提高了，許多書目直接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服务，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傾向。在这种情况下，推薦書目有較大的发展。第二、書目的种类和类型有了很大的扩展。書目著录圖書的对象范围，比封建社会的目录要广泛得多，出現了大量的譯書目录、日文書目录、戏曲目录、小說目录、報刊目录和索引，专科学目开始发展起来，許多在封建社会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和瑣碎不值一顧的圖書，都編出了目录予以反映。不仅書目的品种增加，而且数量龐大。第三、目录学的方法有了新的探索和嘗試。在圖書分类方面，除原有的“經史子集”之外，出現了“声光化电”和“学政杂数”的新体系。圖書排檢的方便，被看作是目录編制的一个要求。上述三方面可以說是资产阶级目录学对于我国目录学的一些貢獻。但是这种貢獻是微小的。资产阶级目录学的发展是不充分的。在这一时期，沒有出現質量很高的目录学著作和很有成就的目录学家。在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加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目录学和圖書館学大量輸入中国，許多学者生搬硬套，主張全盘西化，甚至提出“中国无目录学”的虛无主义的荒謬結論；而另一些人則走上了封建复古主义的道路。这便是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在目录学上的影响和反映。

作为近代目录学史上的一个目录学家，梁启超前期的目录学理論观点和實踐活動，比較有积极意义，体现了资产阶级目录学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及其給目录学所帶來的新的面貌。而梁启超后期的目录学活動，轉而專門研究整理封建正統目录、佛經目录和編制“国学”書目。这种变化，是和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由进步到反动的发展道路相适应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目录学发展的道路。

二

梁启超的目录学实践活动，是从编撰十九世纪当时的译书目录开始的。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灾难深重的中国，改良主义者企图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寻找救国的真理，因而重视介绍和宣传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图书，为它们编纂目录，作为提倡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哲学观点和自然科学知识，以求富国强兵的工具。梁启超说：“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①从18世纪以来，即从明代以来，外国传教士就开始进行翻译图书的工作。所译之书以宗教、医学书为主。19世纪中叶以来，洋务派创立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州的方言馆等机构，也进行译书。这些翻译过来的图书，在客观上，对开通中国人的思想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1890年梁启超本人18岁时，读了《瀛环志略》，才开始知道有所谓世界。梁启超为了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推进其维新改良运动，1896年左右就开始对译书作编目、评介和推荐的工作。《西书提要》便是他为西书编制解题目录的尝试。这一著作缺医学、兵政二门，没有全部完成。（现于《饮冰室文集全编》中可见到其一部分——《西书提要·农学总序》）与此同时，编撰了《西学书目表》四卷，札记一卷，首先刊登在1896年9月的时务报上。这个书目除宗教图书不收外，著录了近二十余年来译出的西书三百多种。另撰有《读西学书法》一卷，评介各书的长短，指导读者阅读的先后缓急的门径。此外还附有“中国人言西学之书”目录，按游记、非游记两类排列；“通商以前之西书”目录，以著书人排列，但不收宗教书。

梁启超编撰《西学书目表》的目的，是他很明显地感觉到在列强的侵略下，中国有灭亡的危险，要求人们学习西书，学习西学，“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以求国家之富强。奉劝封建统治阶级不要“枵然自大，偃然高卧……昧于自知，坐见侵陵”^②。号召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他告诉读者，《西学书目表》中所著录的“此三百种者，择其精要而读之，于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闻矣”。^③这个书目系统地向中国广大知识分子介绍了西方的算学、重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等科技图书和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社会科学及各方面图书，以配合改良主义者所鼓吹的改官制，办学校，立议会，订宪法，筑路开矿，发展工农商业，以求富国强兵的主张。这个书目不收录一本宗教书，是一个进步的地方。在《西学书目表》以前，王韬曾在1889年以《圣教信证》为蓝本，编纂了把多数天主教宣传迷信的书籍包括在内的《泰西著述考》这一书目。可见《西学书目表》在目的上与“泰西著述考”是不完全相同的，同时更不同于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即坚持封建统治秩序而仅仅崇拜西方“船坚炮利”物质文明的态度。梁启超主张全面的向西方学习。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和爱国主义性质的。但梁启超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在书目中处处流露出乞求封建统治阶级猛然觉悟的幻想，

① 《西学书目表·序例》。

② 同上。

③ 同上。

不得不从什么“圣祖仁皇帝”“高宗纯皇帝”(即康熙、乾隆)的“先圣后圣”重视西书中去找根据。他在書目中說:

“大哉，圣人之道，孔子适周，求得百二十国宝書。圣祖仁皇帝，御纂数理精蘊，潤色西算弁諸卷首。高宗純皇帝，欽定四庫总目，凡譯出西書，悉予著录。先圣后圣，其事不同，其揆若一。”^①

梁启超在《讀日本書目志后》(写于1897年)中說得更为清楚:

“愿我公卿讀政治宪法行政学之書，习三条氏之政議，擇究以返觀，发憤以改政，以保我四万万神明之胄。愿我君后讀明治之維新書，借觀于寇讐，而悚厉其新政，以保我万万之疆域。”^②

《西学書目表》將譯書作了系統的整理評介，并且以表下加識語，表上加圈識等方式，指出如何閱讀的方法和書籍的內容及譯本。書目对幫助中国知識界了解西方资产阶級文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当时学者甘云鵬评价該書目时說：“部次門类識別优劣，頗便初学。欲尋西学軌途，固无逾是書者”。^③在西学書目表的影响下，随后出現了許多專門介紹外国譯書的目录。而譯書目录的編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外文書籍的翻譯工作。

1902年，梁启超又編制了另一个書目《东籍月旦》，这是一个日文新書的推荐目录。未完。只写完第一篇普通学內的第一、二两章(倫理學和历史)。最初发表在1902年的《新民丛報》上。他之所以轉而編撰日文書目录，向中国知識界介紹日文新書，是由于他看到，虽然学习英語的人很多，但“除严又陵外，曾无一人能以其学尤思想輸入中国者。……直至通商数十年后之今日，而此事尚不得不有待于讀东籍之人。”^④同时当时直接从西方翻譯过来的社会科学圖書很少，梁启超在《西学書目表》中就已經发现“惟西政各籍，譯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諸門，竟无完帙。”^⑤他认为，虽然东学不如西学，因为东学“无一不从西学来也”，但是由于一般中国人学日文比較容易，因此通过日文書学习，是一个“急就之法”。事实上康有为在此之前，已編撰过《日本書目志》。《东籍月旦》的編制計劃很龐大，其中第一篇普通学中，就計劃包括：倫理學、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經濟等类目。但只完成全部書目的一小部分。書目中有詳細精要的解題，并間插入有讀書法。以幫助讀者解决“某科当先，某科当后。欲学某科，必不可不先治某科。一科之中，某書宜先，某書宜后，某書为良，某書为劣”^⑥的抉擇問題。同《西学書目表》比較起来，《东籍月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側重于社会政治書籍的介紹。而自然科学技术圖書相应地退

① 《西学書目表·序例》。

② 《讀日本書目志后》。

③ 《質学叢書》。

④ 《东籍月旦·敘論》。

⑤ 《西学書目表·序例》。

⑥ 《东籍月旦·敘論》。

居次要地位。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在编《西学书目表》时，当时存在的译书以科技制造方面的为多数。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此时，在戊戌政变的惨痛的教训下，梁启超认为一切改革，必须从社会教育着手，以为改革政治须先从“国民性格”上加以根本改革。因此积极鼓吹“新民之道”。他在《东籍月旦》中说：

“不知学问所以能救国，以其有精神也。苟无精神，则愈博学而心愈愈以腐败……”^①

因而《东籍月旦》把伦理学书籍摆在第一位。次历史、地理等书。很显然，这种观点，一方面说明改良主义者梁启超较前一时期有进一步的认识，另一方面，这种改良主义的“新民之道”也正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社会革命论”相对抗的武器，在当时是反动的。

《东籍月旦》不仅收入日本人的著述，而且也收入西方图书的日译本。凡书目上著录之书有中译本的，也都一一指出。书目选书精少，比《西学书目表》更有推荐性，对读者的指导更为具体。这个书目对于中国知识界也有很大的影响。据杨寿椿的《中国出版界简史》的统计，从1895年至1904年的十年中，我国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图书，要比译自西文的要多出一倍以上。同时这十年中，所谓“政”类图书，即主要是社会科学、哲学类的图书，翻译量猛增，而科技图书锐减。这种情况，在《东籍月旦》中是有所反映的。另一方面，反过来说，这种情况的造成，可能也是与梁启超等改良主义者利用书目这一工具，包括《东籍月旦》在内，积极宣传日文书籍有关。

与编纂《西学书目表》及《东籍月旦》的同时，梁启超在其所主编的《时务报》《湘学报》及《新民丛报》中，都利用了目录学的方法，宣传介绍有利于改良主义思想的图书。他在《时务报》创刊号中，把这种工作定为报纸的四大任务之一。他写道：

“然则报之例当如何？曰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行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自大矣”^②

《湘学报》例言也规定“每学后择录切要书目一二条，附以提要、价目、刻本，俾学者得识门径，便于访购”。

这些报刊上的目录学工作有下列几种形式：刊登书目、新书广告、发表重要图书的序跋及书评等。《湘学报》曾较系统的介绍了建议变法维新的论著，并编制了提要书目。“西学书目表”就是首先发表在《时务报》上的。《时务报》还经常随报附送各书局的书目。《新民丛报》有“介绍新书栏”，这些图书宣传工作，由于通过报刊进行，对读者的影响就更为直接迅速，受其影响的读者面更广。

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逐步高涨，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堕落成为君主立宪派。他们的锋芒转向打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维护封建统治。他们的

① 《东籍月旦》第一章伦理学。

②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所謂新學，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卻，失去了靈魂，而只剩下它的軀殼了”（毛澤東選集第二卷668頁）。特別是在五四運動以後，隨著新文化運動蓬勃開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這時梁啟超就跟著胡適一道，抬出了“國學”“佛學”的招牌，利用目錄學作為工具，為青年做“國學指導”，以阻擋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他的目錄學實踐活動也失去了進步意義，轉而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

1923年梁啟超編撰了《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及《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並附有一篇《治國學雜話》。1925年又撰成《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在這些書目里，梁啟超擺出了許許多多的古書，說這一部青年必須“熟讀成誦”，那一部“總須一讀”；這一部要“全部精讀一過”，那一部“終不可不讀”。他引誘青年說：“倘能依法讀之，則國學根柢略立，可以為將來大成之基矣”。

魯迅先生在当时出色地揭露了这种借“治国学”之名，要青年鑽到古書堆中去的實質。魯迅先生寫道：

“只有几个糊塗透頂的笨牛，真會誠心誠意地來讀經。而且這樣的腳色，也不消和他們辯論。……至於現在的能以他的主張，引起若干議論的，則大概是闊人。闊人決不是笨牛……其實他們的主張並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張，是所謂別有用意；反對者們以為他真相借讀經可以救國，真是‘認以千里’了。我總相信現在的闊人都是聰明人，……至於所掛的招牌是佛學，是孔道，那倒沒有什麼關係。”①

事實也是如此。在当时，引誘青年治所謂“國學”，其目的是要青年“沉靜下去，與人生離開”②抗拒新文化運動和馬列主義的傳播。

《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分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韻文書類、小學書類及文法書類、隨意涉覽書類等五項。幾乎把主要的古書都搬了上來。《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也包括四書、易經、書經等近三十部大部頭古書。梁啟超在書目中斷言：這些書“皆須一讀，若并此未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③當時胡適也編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梁啟超曾為此作了一文，題為《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進行抨擊，說胡適“把應讀書和應備書混為一談。”但從這兩個書目的根本目的看，只是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差。

《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僅對論語、史記等所收各書作了解題。往往一書之解題有數千言。在解題中對書籍的時代、作者、名稱、著述旨意，主要內容，後人補續零亂情況、讀法、該書之校釋之書等等，都作了敘述，並間有考證。

梁啟超在他生平的最後一段時期，較集中地研究中國舊目錄學和佛經目錄。據他的朋友余紹宋說：

① 《民國十六年的讀經》。

② 《華蓋集·青年必讀書》。

③ 《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

“六年前（按：即1927年），予避乱居天津，与任公梁先生过从最密。时任公方撰诸家书目提要，陈数十百种簿录之书于案头，朝夕探讨。”^①

在几年时间内，他完成了许多中国目录学史方面的研究著作和一些古书目录。计有：1923年完成《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1925年完成《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一文，1926年完成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汉志诸子略各书存佚真伪表（附本志以外伪书）》、《考诸子略以外之现存子书》，为《中国图书大辞典》编撰了簿录之部。完成了其中一部分——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部分。于他死后的第二年（1930年）发表在《图书馆学季刊》第四卷三、四合期上。

《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是梁启超对戴东原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戴东原为清代哲学家和考证学家。梁启超对他作了很多研究。这个书目考，是将戴东原的著述纂校，按照年谱，以著作先后为次，无论已成未成，已刻未刻，或存或佚，或著或校，独著共著，皆编入书目。依照朱彝尊《经义考》的体例，辑录了原书中的序言。梁启超并加案语，对有些部分作了考证论列。这个书目考，体例严谨，材料丰富，对个人著述作了系统的整理，不失为一部较好的个人著述书目。

《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一文，最早发表在《图书馆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本文系统地考证叙述了从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起一直到清为止的重要佛经目录。叙述其时代、作者、体例、内容范围，与其他目录之关系，对后世的影响，并评论其得失。并总结了佛经目录在编制方法上的若干特点。他认为，要是拿历代封建正统的儒家目录和佛家经录相比，“不能不叹刘略班志荀簿阮录之太简单太朴素，而痛惜于后此踵作者之无进步也”^②。他还为象郑樵、章学诚这样的目录学家未重视佛经目录而惋惜。他说：“恨其于佛录未一涉览焉。否则其所发掘必更有进，可断言也。”^③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是对汉志诸子略所作的注释和考据。对诸子略中的每一种书，首先注明其存佚，若篇卷有异同的加以注出，对已佚之书，若可以考见它佚于何时的，也加以说明。对伪书详加考证。无论是在刘向、班固以前之伪书或后人伪补，或伪中出伪，都一一加以论辨。对于某些书籍的分类，编次有失当的，梁启超也根据自己的见解加以纠正。此外，他还编著有《汉志诸子略各书存佚真伪表（附本志以外伪书）》及《考诸子略以外之现存子书》，作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的补充。当然，梁启超在这些著作中的见解有的不一定正确。但这些目录学著作是他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的重要成果。

他对中国目录学史最有系统的研究，是他临死前撰写的《中国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这一著作计划包括：一、官录及史志，二、跋释及鉴别，三、藏目及征访，四、部分别录，五、载籍掌故等五部分。但只完成了第一部分。

梁启超在这里所指的“官录”是指的历代中秘书之目录。官署及官立学府藏书目录也附于此。“史志”是指各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后世学者所作的补志及考证笺释补缀也附于此。

① 《饮冰室藏书目录序》（余绍宋）。

② 《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中之位置》。

③ 同上。

私人所編的目录，凡作为各正史艺文志的藍本和先驅的，如阮孝緒《七录》，毋巽《古今書录》，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等等，虽非官書，也附于各相应的史志之前。因此，这一著作研究的范围，包括了我国目录学史上正統目录的主要部分。梁启超在这一著述中，对于从汉刘向别录至清四庫全書总目为止的各部目录，一一考証其存闕佚輯，敘述其内容体例，評論其长短得失，指出它們之間的互相关系。对目录学史上的重要皇家目录和艺文志經籍志作了細緻的研究。并且总结出一些我国目录学的优良傳統。因此这一著述，也包括了梁启超的許多目录学的观点和理論。同时，这一著述，就其研究方法和范围來說，也是近代目录学者对中国目录学史作系統化研究的开端。

上面就是梁启超一生的目录学实践活动情况的簡述。

从上面我們看到，梁启超在目录学方面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期，主要从事新書目录的編纂，宣傳新学，为資产阶级改良主义服务。而在后期，主要从事古書目录的編纂和对封建正統目录与佛經目录的整理研究，宣傳“国学”，为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这种前后期的变化，是与他的政治思想由进步到反动的发展道路有密切联系的。

三

梁启超在目录学的理論研究和書目編制的实践活动中，也提出了一些目录学的理論观点和目录編制的新的方法。比較突出的有下列四个方面：

（一）梁启超主張“著書足以备讀者之顧問，实目录学家之最重要之职务也。”^①在書目工作實踐中，他創造性地发展了作为宣傳圖書、指导閱讀的推荐書目的編制方式方法。

《西学書目表》、《东籍月旦》和《时务報》、《湘學報》等報刊上的“切要書目”以及后来的《国学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和《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等目录，都是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而編制的推荐性書目。具有強烈的思想性。在思想斗争及其尖銳复杂的民主革命时期，这种推荐書目才能很好地宣傳自己的主張，把羣众爭取到自己方面来，使圖書發揮更大的社会作用。梁启超的这些書目，特別是《西学書目表》和《东籍月旦》在社会上所起的影响，証明了这一点。一般說来，梁启超是不主張目录学变成只講宋元版刻的“骨董家”的^②，而是主張目录学的价值，最重要的就在于指导讀者閱讀，向讀者推荐好書，作讀者的“顧問”和响导。他在《佛家經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一文中說：

“道宣录中最有价值之創作，尤在《众經举要轉讀录》一篇。盖佛典浩如烟海，讀者本已穷年莫殫，加以同本異譯，摘品別行，叠屋支牀，益苦繁重。宣公本篇，于異譯別行諸經，各擇其最善之一本以为代表……其裨益于讀者实不少。著書足以备讀者之顧問，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③

① 《佛家經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

② 《飲冰室藏書目录序》。

③ 《佛家經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

梁启超这种把推荐好书,指导阅读定作目录学家的最重要的任务的观点,在当时能明白地提出来,是很卓越的。在封建社会,一般目录学家多注意于著录一代之典籍,反映一代之文化,将目录作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具,或者多注意于著录宋槧元刻将目录作为记帐和标榜藏书精美的工具。而作为指导阅读的推荐性书目,其发展并不是很充分的。在《西学书目表》以前,虽然有《书目答问》《经籍举要》等几种推荐性目录,但它们的推荐性主要表现在选书的标准方面。而梁启超的书目的推荐性,除了选书之外,主要地体现在“解题”和“读书法”中。《西学书目表》后附有《读西学书法》,《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其读书法也是书目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梁启超就用这些解题和读书法,详细地回答读者的“应读之书及其读法,先后之序”的问题。

在《西学书目表》里,他说,当时译出的西书虽然只有三百种左右,数量不多。“然苟不审门径,不知别择,骤涉其藩,亦颇难矣”。^①他所作的“读西学书法”的内容就是“略言各书之长短”,指出“某书宜先读,某书宜缓读”,从而使“初学观之,亦可以略识门径”。^②在编《东籍月旦》时,梁启超也看到当时我国知识界对于日文书籍“能有识择抉者盖寡矣”的情况而编的,《东籍月旦》通过它的解题和阅而插入的读书法,回答读者读东学书应该“某科当先,某科当后,欲学某科必不可不先治某科,一科之中,某书当先,某书当后,某书为良,某书为劣”^③的等等问题。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梁启超也通过其解题及后附的《治国学杂话》一文,不仅宣传了读国学书的必要、方法,而且也为读者指出了“精读”、“熟读”、“可读”、“浏览”、“可读可不读”的“读书门径”。真正起到编著书目,作为读者顾问的作用。

梁启超所创造的在书目后附以读书法(如《西学书目表》),或书目中插入读书法(如《东籍月旦》)的形式,对于宣传图书,指导阅读,的确是一个无拘束又有效的形式。例如《读西学书法》不仅讲述了西学书翻译的源委,而且分门别类地论述了各个科学领域的图书之间的联系、得失和译笔的优劣及读者应有的态度。帮助读者指出要学习一种科学,必须先从何入手,或以什么为中心;指出什么书宜于初学,什么书不宜初学;指出一书中有何部分宜于初学,何部分不宜于初学,读者应如何处置;指出不同译本,以何译本为善;指出学习某门科学时,必须注意使用哪些工具书;指出某书和某书是互相配合的,某书已佚,后书就不可读,在使用时必须注意到;等等。象上面这种对读者的阅读指导,在梁启超的书目中可说是触目皆是。虽然在具体内容上有不正确的地方,但作为推荐书目的编制的一种体例和方法来说,是很可取的。读梁启超的书目,使人没有象看其他书目时经常有的枯燥感觉。梁启超不仅在理论上认为“著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而且在他的书目实践中,真正体现了这一主张。

(二)梁启超在他的《西学书目表》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图书分类体系。提出了一些图书分类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开始冲击中国封建社会被定为“永制”的四部分类法的体系,为近代新分类法的输入和产生,打开了局面。

① 《西学书目表·序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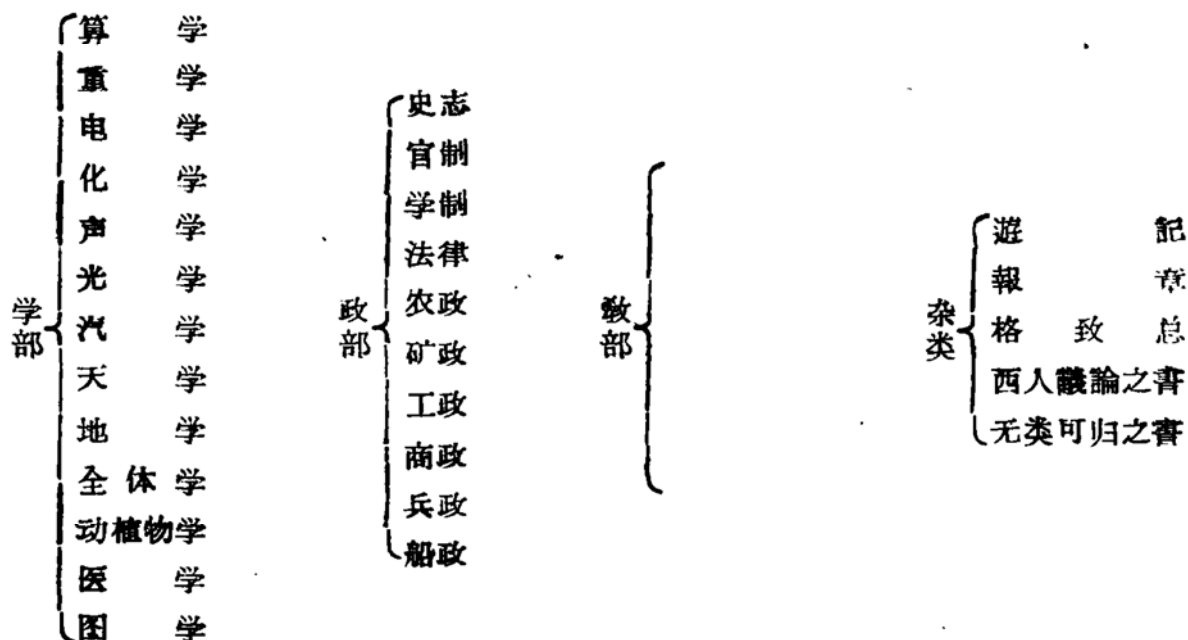
② 同上。

③ 《东籍月旦·叙论》。

不同的图书分类体系，反映着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的思想意识。它具有历史阶级性。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代表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四部分类法，自晋荀勗试创以来，在唐代确定，至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总其大成。在其间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它一直占有几乎是唯一的主导地位，被封建统治者命定为“内阁以为永制”。可是自从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我国封建社会逐渐瓦解，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思想和文化方面，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输入中国，出现了所谓“西学”“新学”的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翻译出版了“西书”、“东书”等新书。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开始出现了初步含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新的图书分类体系及其理论。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的新书分类体系及其理论，便是一个代表。

应该指出，第一个用新的分类体系来组织书目的，并不是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在《西学书目表》以前，至少有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事实上，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所提出的分类体系，和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的分类体系一样，有可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图书分类法的影响。梁启超接触过许多西书，其中不可能不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图书目录。因而不可能不接触到其分类体系。事实上，在《西学书目表》以前，译书公会就曾经翻译过外国的书目。^①因此，梁启超的新分类体系的提出，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外来影响的，但并不是抄袭翻版。从这个分类体系来看，总的说，梁启超是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西学西书的，特别是用改良主义者的眼光来认识的。

新的图书分类体系，作为比较完善提出来的，并加以理论上的阐发，实际上是开始于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的西书分类是：



梁启超还从理论上阐述了 this 体系。他说：

“译出各书，都为三类。一曰学，二曰政。三曰教。……下卷为杂类之書”。

① 見譯書公會章程，附录《現譯各書目》，其中有从日文譯来的庆长以来名人著述書目（和学家），庆长以来名人著述書目（汉学家）等两种。

“西学各書分类最难。凡一切政皆出于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則某学某政之各門不能分。今取便讀者，强为区分”。

“門类之先后，西学之屬，先虛而后实。盖有形有質之学皆从无形无質而生也。故算学重学为首，电化声光汽等次之，天地人（謂全体学）、物（謂动植物学）等次之。医学图学全屬人事，故居末焉。西政之屬，以通知四国为第一义，故史志居首，官制学校政所自出，故次之，法律所以治天下，故次之，能富而后能强，故农矿工商次之，而兵居末焉。农者，地面之产。矿者，地中之产。工以作之，作此二者也。商以行之，行此三者也。此四端之先后也。船政与海軍相关，故附其后。”^①

这个分类体系及其理論，現在看来是很幼稚的。但在当时，它的确給我国目录学史打开了新的一頁。它和經、史、子、集的四部分类体系及其理論解釋，是很不相同的。

梁启超的这个分类体系，除敎部不算外，为学、政、杂三大类。这里我們可以看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綜合性圖書三大部类划分的雛形。当然这是很模糊的，甚至是有許多矛盾的。例如政类中的农、矿、工、船等政，其中除有經济管理方面以外，是屬於技术科学的，不应列入政部。但是这里正反映出梁启超是用中国人的眼光，特别是用改良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待的。改良主义者感到要使中国富强，必須推行他們所宣傳的“新政”，而“新政”的内容大致是：改官制、办学校、訂宪会、立議會、筑路开矿，发展工、农、商业，以求富国强兵。而“西学書目表”中的政类内容是和这些“新政”的内容大致相同的。封建頑固派和洋务派，只主張向外国学习一点制造枪炮的知識，以求“船坚砲利”作为当务之急。而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卻认为應該从政治、教育、經济的改革开始，“能富而后能强”^②，把“兵政”居于分类的末位。这一点也說明梁启超是以改良主义者的理論为基础而确定分类体系的。有别于封建統治者的观点。

此外，这个分类体系还有很明显的资产阶級唯心主义观点。认为“有形有質之学皆从无形无質而生也”“一切政皆出于学”从而决定各类之間的先后次序。这种解釋反映了资产阶級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虽然这个分类体系是为“西書”而設的，沒有用来分中国書。可是它卻給后来人們拋棄四部分类法而改用新体系来組織中国書开拓了局面。例如1904年編成的《古越藏書樓書目》，就是第一次用“学”“政”两大部类的新体系，来对中文圖書进行分类的。此后，目录学家和圖書館界将“中学”和“西学”，“旧書”和“新書”結合考虑斟酌，产生了以资产阶級思想为基础，也結合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特点的許多圖書分类法。梁启超的貢獻就在于对旧分类的冲击作用和对新的分类的启蒙作用。

梁启超在《西学書目表》中，也很注意圖書的归类問題。这也是他一个突出的地方。为了避免学者对类目的意义与范围有所誤解，他常常給各个类目下定义，定范围。并且在《西学書目表》敍例中也提出了几点圖書归类的基本原则。当然，当时梁启超对自然科学与技术

① 《西学書目表·序例》。

② 同上。

的了解还不是十分精通的，因此他所下的定义范围，所举的例子，是有错误的。但他注意到图书归类的问题，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梁启超提出目录学应具有详尽、准确、严谨的科学态度，主张目录学对于图书要“全收无遗”“一一详载”、“辨别真伪”“抱残守缺”“蒐采遗逸”“设立存目”“令读者毋惑”。同时反对“爱古薄今”，主张目录学的重点，应该放在新书和现存之书方面。

梁启超把目录看作是考查著作史、图书史、学术文化史和藏书史的材料，主张目录，特别是具有历史文献意义的国家目录和史书艺文志经籍志，对于图书应该有完备、正确的著录和解题，对于亡佚残缺图书应予以记载，对于真伪情况要加以考证，对于不同译笔和版本，须一一详叙，对于抽译抽印别裁图书，要求注明出处。总之要达到“令学者毋惑”。

从他对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地位的评介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梁启超的上述观点。他认为佛经目录在目录学上的优点是：“凡一书之传译渊源，译者小传，译时，译地，靡不詳叙”“辨别真伪极严，凡可疑之书皆详审考证，别存其目”“比较甚严，凡一书而同时或先后异译者，辄詳为叙列，勘其异同得失。在一丛书中抽译一二种或在一书中抽译一二篇而别题书名者，皆一一求其出处，分别詳明，使学者毋惑”。“蒐采遗逸甚勤，虽已佚之书，亦必存其目”^①等等。这里梁启超所称许的优点，也正是他自己对于目录学的主张。

例如他很推崇姚振宗的《三国艺文志》及《后汉艺文志》。认为这个书目是“最精勘足称者”，是由于它具有下列五个特点：

“一、著色事略，一一詳载，令学者得考见其环境及学术渊源。二、著录各书皆注出处。……三、其书有近人辑本者皆举列之。四、后人对于原书有批评者，皆录入。五、有疑问者，附按语考证之。……断代极谨严，极少滥收闖入之弊，至搜罗之博，则此两时代之著作，殆已全收无遗”。^②

正因为梁启超主张“搜罗至博”，“全收无遗”，因此他极力主张目录学要蒐采遗逸，著录亡佚图书。设立存目制度。他说：

“抱残守缺，确目录学家应有之态度”。^③

他认为目录学要注意著录亡书。他说：

“书籍孳乳日出，亦散亡代谢，赖有遗录，存彼蛻痕，虽器实已渝，可識其名数”，以作为“将来采访之资”。^④

他主张目录对于不收录的图书，（例如内容恶劣之书，疑惑伪妄之书等），应设存目，藉以记录，“使后世勿为所惑”。认为这样做，才是谨慎、严肃的态度。他对《四库全书总目》在著录之外另设存目制度很赞许。他认为，虽然决定图书列入著录抑或存目，其标准不

① 《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

② 《图书大辞典簿录部·官录及史志》。

③ 《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

④ 《图书大辞典簿录部·官录及史志》。

一定确当，但是这作为目录学中的一种体例，是一种很好的创造。他说：

“著录外别设存目，为向来簿录之所无。自有此例，以各书本身价值为标准（所估价值当否又当别论）既示别裁，不使濫劣之書与名著駢列，致讀者淆視听而斂精神；亦不致第二流以下之書，并其名而湮沒。可謂两全其道。”^①

被梁启超称为“以目录体例論，最合理之作”的隋之“法經”，梁启超也指出其优点之一，在于：

“别生及疑伪者，虽屏不入藏。仍著其目，使后世勿为所惑”。^②

梁启超的这种“抱残守缺”的观点，其出发点在于使目录真正具有丰富的资料价值。具有科学文化史的意义。这种目录学的詳尽、准确、严谨的科学态度，也可以说是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汉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和其后的许多目录，就编制体例而论是严谨的。（当然从思想内容而论，都是以封建思想为指导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目录学史上，我国不少目录学家也倡导过这种态度。特别是郑樵倡亡书之学，更是梁启超的“抱残守缺”的观点的先驱。清代的许多目录学家和版本学家，更把“存其真面，以待来兹”的科学客观态度作为重要的原则。

梁启超主张目录学要抱残守缺，但他并不主张把目录学仅仅变为专门去考查亡书残卷的考据学。相反，他却反对目录学中的“爱古薄今”的倾向，而主张目录学的重点，应该放在新书和现存之书方面。他说：

“尤有一事足致遗憾者，清人爱古薄今，上下同揆。四库于当代著述，收录已稀。私家藏目，亦少注意此点，以致递年新撰诸书，无总籍之可稽。吾儕欲草古今书录，时代愈近而愈感困难。可为太息也”。^③

他在批评图书集成经籍典时也說：

“此书于清初书籍存亡状况，无足资考证者。因其大部分乃彙录旧史或专书之全文。……所列之書，并非现存。现存之書，前人无述者，则并不搜集也。”^④

这个观点，是很可贵的。也是梁启超在理论上对目录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不注意搜集与反映现存之书与新书，所列书目，并非现存，这是我国目录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例子的一种不良倾向。例如《旧唐书经籍志》就是全抄毋奭的《古今书录》。因此旧唐志不载“古今书录”之后三百年間唐代后期的书籍。梁启超对此深为遗憾，他说：

① 《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

② 《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

③ 《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

④ 同上。

“宋人修唐書之最大責任，謂宜將唐人著作全部網羅入志，庶使一代文獻得所總匯。開元以後，唐祚尚三百年，為中國歷史文化最盛時代，著述之富，足與自漢迄隋六七百年間數量相埒。今史臣怠于搜訪……將盛唐以降三百年學朮成績一概抹殺！吾輩今日讀唐志，……將以考唐籍耶？則所可考見者殆不及百之一二！”^①

象這樣的書目，的確是“無足資考証”的。事實上，當代的現存之書與新書，在後代就會成為古書和少見之書，就會可能有一部分亡佚殘闕。可見梁啟超的“抱殘守缺”與反對“愛古薄今”，兩者是一致的。總的目的，是要使目錄“搜集至博”，“足資考証”。具有史料價值。

（四）梁啟超總結了我國目錄學史上史家目錄學、讀書家目錄學、藏書家目錄學及目錄家目錄學的对目錄學性質作用的基本觀點，將它們進行綜合和系統化，從而提出了較全面的見解。

梁啟超認為，自漢代產生別錄七略以後，歷代沿其例，陸續校書編目。特別是在宋明以來，由於版刻盛行，圖書的流傳收集日益容易。另一方面，書籍遭到散佚淘汰也更為迅速。公私藏書訪書，多有目錄。因而目錄學便“以附庸蔚為大國”。據他估計，當時（指梁啟超撰《中國圖書大辭典簿錄之部官錄及史志》一文時）現存的各代書目，合單行本與各專書中之別出本，約有二、三百種。已經亡佚或存佚不詳的，也有一百餘種。他認為，總括起來，目錄及目錄學對於文化學朮的作用有四條。就是：

1. “載籍浩博，決非一人之力所能盡藏所能盡讀。流覽諸錄，可以屬知古今著作之大凡，有解題者，讀其解題，雖未睹其原書，亦可知梗概。”

2. “書籍孳乳日出，亦散亡代謝，頗有遺錄，存彼蛻痕。雖器實已淪，可識其名數。又某時代某類書實始創作或作者獨多，某類書在某時代已寥落罕聞或散亡最劇，綜而校之，學風見焉。”

3. “稀見祕籍，識者知珍。彌微僅存，流傳有緒。博稽諸家著錄，可以稱其展轉儲藏之所在，按圖索驥，或整理流通，或取裁述作。”

4. “學朮分化發展，著述種類隨之而日趨繁賾，辨析流別，業成專門。門類區分，或累代遞遷，或因人而異，博觀互校得失斯見，循此以稱學海之派分淵匯，察藝林之爭坵條數，知類通方，此其顛步。”^②

從上面梁啟超對目錄與目錄學作用的估計看來，他是把目錄與目錄學看作是幫助查考各時代的著述史、圖書史、學朮文化史、藏書史和進行讀書治學的重要工具的。

梁啟超所說的目錄與目錄學的第一點作用，是說目錄與目錄學是掌握歷代圖書狀況和了解圖書主要內容的工具，通過目錄學可以考查古今所有一切圖書。這一點，唐代目錄學家毋

① 《圖書大辭典簿錄之部·官錄及史志》。

② 同上。

梁启超已说过。他说目录能够“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覽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詞……不見古人之面，而見古人之心。”^①而梁启超加以繼承和發揮。例如他把汉書藝文志看作是“欲考先秦学朮渊源流別及古代書籍存佚真偽，必以此志为基本。”^②隋書經籍志是“唐初所傳中古書籍以为总汇”。^③

梁启超所说的目录与目录学的第二点作用，是说目录与目录学可以辨章学朮，考錄学派源流。这一观点，是史家目录学的重要内容。郑樵与章学誠大力倡导之。郑樵說：“类例既分，学朮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藏緯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学，傳于江左。傳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观其書可以知其学之源流。或旧无其書而有其学者，是为新出之学，非古道也”。^④梁启超也繼承和闡发了这种观点。

梁启超所说的目录与目录学的第三个作用，是说目录与目录学是作为考見圖書版本，帮助訪書藏書校書的工具。这一点，正是所謂藏書家目录学的观点。錢曾、顾千里、黃尧圃已倡于前。梁启超也承认和繼承了这派意見。虽然他不太主張把目录学变成专门研究“百宋千元”版刻的“古董”，但他也承认这是目录学的一个派別。例如梁启超在談到“天祿琳琅書目”时說：

“自清两錢（謙益、曾）以宋板相矜尚，世漸趋之。及此書以鉴藏書画之体制編書目，書籍及成为「古董化」或「美朮欣賞品」为籀录界別开一派。”^⑤

梁启超所说的目录与目录学的第四点作用，显然是所謂讀書家目录学的观点。在梁启超以前，清王鳴盛說：“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必从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⑥清江藩也說：“目录之学，讀書入門之学也。”^⑦梁启超繼承并大力發揮了这种讀書家目录学的观点。“著書足以备讀者之顧問，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这便是梁启超这种观点的最集中的体现。

此外，梁启超也提出：

“就目录学的立場言之，則取便檢查，亦正是此学中一重要条件。”^⑧

可見他也吸取了所謂目录家目录学的观点与内容。而这个观点，在近代資產階級目录学中，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

上述史家目录学、讀書家目录学、藏書家目录学及目录家目录学，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的

① 《古今書录序》。

② 《圖書大辞典籀录之部·官录及史志》。

③ 同上。

④ 《通志校讎略》。

⑤ 《圖書大辞典籀录之部·官录及史志》。

⑥ 《十七史商榷》。

⑦ 《师郑堂集》。

⑧ 《佛家經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

几个主要流派。他们各引一端，各自发展。事实上，他们可以说都对了一部分，但又都不完全，具有片面性。目录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目录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目录学的价值与任务同样也不是单一的。梁启超将各派观点结合起来，提出了较为全面的观点，这是梁启超在目录学理论方面的一个发展。

梁启超对目录学的观点，可以说“主要的是读书家目录学与史家目录学相结合的观点。同时也具有藏书家目录学与目录家目录学的一些主要内容。但他并不是将它们机械地加在一起，而是作了综合和系统化的。

梁启超认为，就目录与目录的性质而论，“实总函四部而统其端”^①这个见解也是正确的。因而梁启超对于封建社会中历代书目，将目录一类列入史部，感到“名实未安”，而提出要“别建一部，用冠群籍”^②的确自此以后有许多新分类法将目录与目录学作为独立一类，列于首位，或列入总类。这可能是与梁启超的见解有一定联系的。

梁启超认为，目录是“俾凡挈治任何部类之遗典者，皆于此问津焉。”^③这是对目录学于读书治学作用的中肯估计。

梁启超还指出，目录书由于“作者之地位及其性格识见等等区别，所成之书其范围与体裁自不能从同”因此，他认为目录可以分为五种，即：官录及史志、跋释及鉴别、藏目及征访、部分别录、载籍掌故。^④大致说来，这种分法尚能基本概括古代目录的范围与类型的。当然，他没有很好地概括当时已出现的许多书目种类，象西学书目表，东籍月旦等书目。此外，专科学目地位也不甚明确。这种目录种类的分法，他主要是针对封建社会时期的目录而言的。

四

要确定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观点与实践活动在目录学史上的位置，对它们作出正确的估价，应该联系近代目录学的状况来加以考察。

前面已经说过，近代目录学史上，出现了资产阶级目录学，它给目录学带来了一些新的面貌。这个新的面貌的出现，是与梁启超的目录学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分不开的。

首先，梁启超编纂《西学书目表》《东籍月旦》等书目，宣传新学，推进维新改良运动，起了较大的政治影响，把目录学与社会的政治思想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提高了目录学为政治服务的作用，加强了目录的思想性和战斗性，从而提高了目录学的社会作用。在目录学理论上，梁启超所提出的“著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实目录学家之最重要之职务也”的观点，也促进了推荐书目的发展，为书目的思想性、战斗性和社会作用的加强，提供了理论根据。目录的政治思想性的加强和社会影响的扩大，是与这一时期复杂紧张的政治斗争分不开的。

其次，梁启超扩大了目录学理论研究和目录工作的领域。把佛经目录作为中国目录学史的一个部分加以研究，是从梁启超开始的。他提出的在目录组织中“取便检查”是目录学的

① 《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一个重要条件的观点，也反映了近代目录编制方法的进步，并且促进了这个进步。这个观点在以后的资产阶级目录学中，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梁启超编制西书目录，东书目录，不仅影响了其他同类目录的出现，而且也使目录反映图书的范围得到扩大，目录的种类增多。

第三，梁启超对目录学的新方法进行了一些尝试。例如《西学书目表》的分类表是我国资产阶级用新的知识体系分类图书的最早的创举。

以上三方面，正是我国近代目录学史上资产阶级目录学产生之后所出现的新面貌。而梁启超在这些方面，具有发凡起例、开拓局面的作用。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他的这种地位，看来在目录学方面也有所表现。

但是，应该看到梁启超的这种作用，是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梁启超的目录学实践和理论研究，缺乏长时间的精深的努力。往往是草率求成，甚至是刚刚开始，便宣告终结。他的许多目录都不完全，只是编制了一个开头，就急于发表，后面的部分就不了了之，象《西书提要》和《东籍月旦》都是如此。他写的目录学理论著作，也有类似的情况，“中国图书大辞典簿录之属”便是一部没有完成的著作。其二，梁启超在目录学上的积极作用，主要是表现在他的前期活动上，而他的后期，随着他的政治思想的堕落，在目录学上有创造意义的成就较少。

梁启超的一生，是从进步转为反动的一生。他的后期成为人民所唾弃的地主买办阶级的可耻代言人。加之他的“流质善变”“哗众取宠”和“浮光掠影”的品质，使他后期名誉扫地。我们评述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不能不看到他的根本的和主要的方面——改良主义思想，并且不能不看到他在后期对中国社会发展所起的反动作用。这些都在他的后期目录学实践活动中有明显的反映。他所编制的各种“国学”书目，就是出自于极其反动的目的的，并且给当时社会上，特别是对青年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是应该彻底批判的。在目录学理论观点方面，特别是在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方面，对于解放前资产阶级目录学者的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对于这种资产阶级目录学的观点，今天也同样需要进行彻底的批判。

总起来说，关于梁启超的政治态度和文化思想（包括目录学的观点）的阶级实质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我们可以用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话作为概括和总结。毛泽东同志说：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有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种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去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89—690页。